

物性驱力与性别制衡：《屋顶上的女人》中权力关系的三维重写

林玉方 吕艳华*

内蒙古大学外国语学院

DOI:10.12238/er.v8i11.6600

[摘要] 该研究立足于物叙事研究前沿，以《屋顶上的女人》中诸物为分析对象，突破以性别对立为核心的传统阐释路径。研究揭示，莱辛通过书写身体、太阳、毯子等物的物质性与能动性，构建出一个由非人行动元驱动的权力场域。这些物不仅是隐喻符号，更是介入叙事、重塑权力关系的关键行动者，最终在屋顶这一物理—符号空间中达成动态制衡。小说由此展现了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视野，为理解莱辛的叙事哲学与平等观念提供了新的物性视角。

[关键词] 物叙事；性别制衡；物性驱力；多丽丝·莱辛；《屋顶上的女人》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Thingly Drive and Gendered Counterpoise: A Three-Dimensional Rewriting of Power Relations in *A Woman on a Roof*

Yufang Lin, Yanhua Lv*

Foreign Languages College,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Abstract: Grounded in the emerging field of thing narratives, this study focuses on various things in Doris Lessing's *A Woman on a Roof* to move beyond traditional interpretations centered on gender opposition. It reveals how Lessing constructs a power field driven by nonhuman actants through her depiction of the materiality and agency of things such as the woman's body, the sun, and the blankets. These things function not only as metaphorical signs but also as key actants that intervene in the narrative and reshape power relations, ultimately achieving a dynamic equilibrium within the roof's physical-symbolic space. Thus, the narrative opens an ethical perspective beyond anthropocentrism, offering a thing-oriented lens through which to understand Lessing's narrative philosophy and her vision of equality.

Keywords: Thing Narratives; Gendered Counterpoise; Thingly Drive; Doris Lessing; *A Woman on a Roof*

引言

近年来，人文社科领域蓬勃兴起的“物转向”(thingly turn)思潮，深刻重塑了当代叙事学的理论疆域与研究范式。正如傅修延所指出的，这一范式转换的本质在于“将聚光灯对准原先处于陪衬地位的物，使其和人一道成为文学研究的主要对象^[1]”，旨在打破人类中心主义 (anthropocentrism) 的桎梏，探寻物之本真性 (thingness) 与能动性 (agency)。在此背景下，物叙事 (thing narrative) 研究应运而生，聚焦于“物如何得以讲述以及物在叙事意义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唐伟胜在《物性叙事研究》中系统提出了物叙事分析的三种模式：作为符号的物 (thing as signs)、作为行动者的物 (thing as actors) 与作为本体的物 (thing as ontology)^[2]。这一“三维”框架不仅为文本细读提供了方法论工具，也推动了叙事学向后人类中心主义的转型。

多丽丝·莱辛作为英国战后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以其

对两性关系的深刻洞察而著称。她曾获诺贝尔文学奖，被誉为“女性经验的史诗作者，以怀疑主义、炽热的激情和预言的力量，审视分裂的文明”。莱辛对性别关系的探讨超越了简单的二元对立，致力于在差异中寻求两性的和谐与统一。其短篇小说《屋顶上的女人》正是这一主题的典型代表，刻画了三名建筑工人与一位晒日光浴的女性在屋顶这一特定空间中所展开的微妙的权力博弈与性别危机。现有研究多从女性主义、凝视理论、权力或空间叙事等视角切入，但对作品中“物”的系统性探讨，尤其是对“物能动性”与“物本体性”的讨论，仍显不足。

本文认为，小说中一系列关键物项——女性身体、太阳、毯子、起重机与屋顶——并不仅作为背景或符号存在，更是承载叙事动因与本体意义的重要行动元。它们共同参与并重构了权力关系，推动叙事走向一种动态、非零和的性别制衡。借助唐伟胜所提出的物叙事三维分析框架，即“作为符号的

物”“作为行动者的物”与“作为本体的物”^[2]，本文试图对上述物项进行细读，最终论证莱辛一种基于物性互联与差异共生的深层平等观。

1 物的三维叙事与性别符号的解构

在物叙事的理论视野中，“物”摆脱其被动客体地位，承担多重复合的叙事功能。唐伟胜在《物性叙事研究》中明确区分物叙事研究的三种模式：“作为符号的物”关注其文化意涵的承载；“作为行动者的物”强调其推动情节的能动性；而“作为本体的物”则指向物超越表征的自在存在^[2]。这一三维框架为解读《屋顶上的女人》中物的意义提供了扎实的理论基础。

小说中的物远非情节陪衬，而是具有显著本体性与叙事能动性的行动元，它们协同作用，既解构了传统的性别权力结构，也构建起一种动态平衡的系统。本节将依循唐伟胜的三维模式，对各关键物项进行剖析，以此阐明莱辛如何借物性叙事超越性别对立的窠臼，传达其深刻的平等愿景。

1.1 女性身体：从被凝视的符号到反抗的本体

当前学界对《屋顶上的女人》中“女性身体”的解读，多数仍囿于“符号的物”这一模式，聚焦其作为“被凝视的客体”所承载的性别政治与文化隐喻。这类研究虽敏锐，却在很大程度上简化了女性身体在叙事中更为复杂的能动角色。恰如张进在《论物质性诗学》中所批判的——“传统文学批评将文学作品缩减为外部世界或作家心理的透明窗户，而文本自身的物质性以及文本的具体语言程序则处于被抛弃的危险之中^[3]。”传统解读凝固了文本物质性流动的生命力。事实上，莱辛笔下的女子身体绝非被动符号，更是一个主动的行动者与具有深刻本体性的存在。

在小说中，女性身体首先呈现为强大的“符号”：她静卧屋顶，成为男性工人凝视的焦点，承载欲望投射与男性气概确认的功能，揭示出性别权力中的物化机制。然而，若解读止步于此，便落入莱辛的叙事陷阱。该身体更是一个强大的叙事“行动者”：其存在本身——安静的、古铜色的身体——是整个叙事冲突的发动机。每一次翻身、每一动作都直接接触男性的反应链条，从口哨、调侃到跺脚、叫喊，乃至汤姆的迷恋与告白。并非男性在主动“凝视”，而是女性的身体“迫使”他们反应，充分体现了物作为“行动者”推动情节的核心动力。

最为深刻的是，莱辛通过“作为本体的物”彻底颠覆其符号意义。女子身体的本体性，体现于莱辛拒绝让其进入符号交换系统。她的反抗不在于言辞，而在于物质性的沉默与存在的自足：工人们的言语撞击的是她“仿佛聋了”的耳膜这一物理器官，而非心理主体；她专注于感受阳光的温度与皮肤的触感，成为一个感受阳光的物理实体。这实践了物叙事“直面物本身”的伦理，悬置文化符号，聚焦物质性存在。身体从“被凝视的客体”转变为“绝对自在的他者存在”，使得男性所有符号化努力均告徒劳，并迎来汤姆告白失败的必然“幻灭”。傅修延所言“物的显现带来诱惑，而欲望的满足往往又意味着幻灭^[1]。”在此得到深层体现：幻灭的根

源是人类符号系统在面对拒绝被符号化的纯粹本体性存在时的彻底失效，从而实现“物自体”的文学性接近。

正如汪民安在综述“物的转向”时所指出的，“客体（物）正是在主体的沉默中，在它自身的孤独和偶在中，在它和其他客体的脆弱关系中，赫然地闪现^[4]。”女子的沉默正是促成“主体沉默”并让身体作为“绝对之物”赫然显现的关键。她的存在不再关乎性别博弈，而成为物性自身对人文符号的超越与胜利。

1.2 太阳与毯子：资源争夺中的阶级与性别政治

除了女性身体，太阳与毯子作为贯穿故事的关键物，同样凭借其符号象征揭示了阶级与性别差异。开篇处，工人在烈日下劳作，而女子却在同一天光下坦然沐浴。此时的太阳不仅形成景观，还以其存在暗示时间与空间，构建出独特的“景深（perspective）^[5]”。莱辛笔下连续六日的烈日，既呈现出屋顶暴晒场景的空间透视，也暗示了持久难耐的时间纵深。太阳作为不偏不倚的自然力，同照耀却也同等炙烤——工人不堪忍受，视其为底层压力的象征；女子却享受其温暖，视其为自我价值的见证。阶级差异决定了同一物的不同意义。

毯子的使用方式同样标识出这种差异：女子用以追求美观，男性则迫切需要其实用性以遮阳；一为主动享受专属之物，一为被动借用无奈之需。张进指出，“文本中的物不是意义的载体，它本身即意义^[3]”，毯子在此已不仅是物品，更是社会身份的映射。

然而符号解读仅触及表层，藏在背后的物叙事推动力往往被雪藏。传统解读一般认为是屋顶上晒日光浴女子的沉默引发了修房工人们的愤怒唾骂，因而将人物冲突原因指向性别对立和凝视。然而从物性叙事视角来看，太阳的光热属性和女子身上的毯子的遮蔽功能这些物质性（materiality）才是引发冲突的深层动因，因为故事中的物从来都不会完全受人支配，很多情况下它们会推波助澜^[5]。太阳的物理热度灼伤工人，迫使劳动中断，从而提供了“凝视的闲暇”；毯子因其遮蔽属性激发窥视欲，被风吹落更直接引爆情节高潮。在此，它们不再是背景道具，而是具有施动能力的关键行动元，如简·贝内特所称的“活力的物”，以其非人能动性推动叙事进程。

从物本体的角度看，太阳以其绝对中立性——漠视阶级与性别，同照耀与炙烤，反而暴露了人类社会固有的不公。毯子则以其实际的物理属性，成为视觉权力争夺的战场。比尔·布朗的《物论》提醒我们，当物脱离其功能网络、其“物性”得以显现，便可能挑战固有认知与权力结构。莱辛通过这些物的自主性干预揭示出：冲突根源并非单纯的性别对立，而是人类在不可控的物性力量面前，依自身位置做出的不同反应。最终，太阳依旧东升西落，毯子依旧随风拂动，它们自在存在，而人类的喧嚣争斗，不过是其物性舞台上的一段插曲。

1.3 起重机：悬置的巨臂与叙事的双重动力

莱辛两次描写了“牛津道上一个建筑工地的巨型起重机

回”及其“黑色的吊臂回”。这一庞然大物不仅是父权制工业霸权的冰冷符号，更在年轻汤姆的幻想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从一个静态象征转化为一个动态的“叙事行动者”。

它那“挥着”的机械臂，直接触发了汤姆的幻想行为：“汤姆想象着自己正在操作起重机，伸出吊臂将她抱起……放到他身边回。”在此，起重机不再是背景，而是汤姆用以连接、控制远方女子的唯一物质工具，其物质功能性（吊臂的可操作性）直接催化并推动了叙事进程，生动体现了唐伟胜所言“作为行动者的物”如何“作用于人物活动，推动叙事进程回。”然而，莱辛对起重机叙事功能的挖掘远不止于此。若跳出汤姆的主观视角，从其“作为本体的物”的维度审视，起重机持续在场却又始终静默、闲置的物理存在本身，便构成了一种更为深刻的叙事力量。它像一个绝对中立的见证者，以其恒定的钢铁之躯，凝视着人类欲望的徒劳。当汤姆最终发现女子早已悄然移开时，起重机的静止获得了强烈的反讽意味：汤姆幻想通过它来“拯救”和“连接”，而女子早已主动脱离了被凝视的场域。他所依赖的工业力量在真实的人际疏离面前毫无用处。

在此，莱辛巧妙地运用了“无限隐退的物”之策略。起重机不推动情节，却以其不可穿透、不可掌控的纯粹物质在场，生产出一种疏离感与真实感。它喻示着一个独立运行的物质世界，这个世界冷漠地运转，既不回应幻想，也不评判骚扰。它仅仅是“在那里”，而这存在本身，就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幻想构成了最彻底的无声嘲讽与消解。

1.4 屋顶：物的系统联动与动态平衡的生成

上述分析表明，这场冲突绝非仅源于人类行动元之间的性别政治，而是由一个由“人”与“非人”行动元共同编织的动态网络所推动。借助拉图尔（Latour）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Theory）^[7]视角可见，太阳的光热、毯子的遮蔽性、起重机的沉默巨影以及女子身体的物质性，皆与人类角色一样，成为具有能动性（agency）的行动元。它们彼此联结、互动与博弈，共同构成了屋顶上这场充满张力的戏剧。该行动者网络既催生了冲突，也预设了其特定形式与最终走向动态平衡的可能。而这一切发生的物理场域与关键支点，正是那个常被符号解读所遮蔽的、作为物质性平台存在的屋顶。

屋顶首先不是一个隐喻，而是一个抬升的、坚硬的物理平台（本体性）。这一物质属性既使它成为女子寻求自由的飞地，也将其置于凝视的焦点。屋顶以其高度强制改写了传统权力坐标：女性获得俯视的空间权力，男性工人则陷入仰视的结构劣势。然而，其开放性也使女子无法真正隐匿，边界在隔离的同时也将她暴露。正是在这一物理舞台上，太阳的炙烤（本体）才能同时成为工人的煎熬与女子的享受（符号差异），从而引爆阶级怨愤；毯子的织物（本体）才能成为视觉访问权争夺的焦点；起重机的沉默巨影（本体）才能

成为一种笼罩性的压迫存在。而女子的身体，也因其所处的位置，使其沉默成为一种更具威力的、自上而下的拒绝。

因此，最终的平衡实为物系统内部各种力量相互制衡的结果：男性虽占据话语与凝视的主动，却被屋顶的空间结构与太阳的物理折磨所削弱；女性虽表面失语且被物化，却凭借屋顶赋予的空间权力与身体的自洽状态，构成有效的反制。莱辛通过这一精妙的物性装置系统揭示出，权力实质上是一种流动的、多维度的力量，远非简单的性别二元对立能概括。

2 结语

通过物叙事的三维框架重读《屋顶上的女人》，本文认为莱辛并非简单控诉男性压迫或歌颂女性反抗，而是构建了一个由物（身体、太阳、毯子、起重机、屋顶）所驱动的复杂权力场。莱辛的平等观是一种后人类中心主义的深刻洞察：她超越了“性别战争”的二元叙事，将人物还原为在特定物质条件（烈日、高空）和物性关系（凝视、遮蔽）中活动的“行动元”。在这一视野下，权力不仅存在于话语中，更流通于阳光的热量、屋顶的高度、毯子的织物之中。最终的平衡是一种物系统内部的动态制衡，是多种物质性力量相互交锋和抵消的结果，呈现了一种基于差异与制衡的、更为复杂的平等观。

这体现了莱辛独特的“物性诗学”创作理念：让人退后，使物成为叙事的主要动力。物性的自行言说解构了人类强加的文化符号，重塑了我们对冲突与平等的理解。这一策略与唐伟胜倡导的“倾听物语”“让物性自显”的物叙事美学高度契合。在“物转向”的哲学背景下，莱辛的小说以文学想象先行实践了打破人类中心主义叙事成规的可能，为我们理解人类与非人类力量的纠缠提供了重要参考。

【参考文献】

- [1]傅修延.文学是“人学”也是“物学”——物叙事与意义世界的形成[J].天津社会科学,2021(5):161-173.
 - [2]唐伟胜.物性叙事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23.
 - [3]张进.论物质性诗学[J].文艺理论研究,2013,33(4):11-18.
 - [4]汪民安.物的转向[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5(3):96-106.
 - [5]傅修延,丁玫.论叙事中物的流动及其对故事形态的影响[J].社会科学文摘,2025(2):54-56.
 - [6]Lessing, D.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的故事[M].范文美,译.广州:花城出版社,1998.
 - [7]Latour, B.(2005).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the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作者简介：**
林玉方（1999-），女，汉族，贵州黔南，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英国文学。
吕艳华（1972-），女，内蒙古呼和浩特人，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英语文学、澳大利亚文学。